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 有利国际环境的积极营造 *

陶文钊

【内容摘要】 从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来看，过去近四十年中有五个重大的节点：中美关系正常化，应对冷战结束的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加二十国集团，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与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日内瓦的演讲。这些节点既体现了中国对发展机会的把握，也说明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抓住了机遇，以开放倒逼改革，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而且现在已经有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既反映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合作项目的推进上，也体现在中国和有关国家共同推动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构筑上。当前国际环境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增强了；另一方面，“树大招风”，国际社会产生了新一波“中国威胁论”。中国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对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方面都坚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保持战略定力，使国际环境继续朝着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国际环境 互利共赢 中美关系 战略定力

【作者简介】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20）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8)03-0001-1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3001

*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与周边合作机制创新”智库团队的研究成果。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已经将近40年了。这40年来，世界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状态，国际环境总的说来是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也抓住了机遇，并且有效应对了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冲击，确保了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持续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治理，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越来越频密，质量也越来越高。这既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必然结果。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国际环境的五个重大节点

第一个节点，中美关系正常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中美建交的谈判是同时进行的，这并非时间上的巧合。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中，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重要一环。在1977和1978年，邓小平多次会见美国政要、议员、记者和外国友人，敦促卡特政府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上议事日程。1978年2月邓小平与挪威外交大臣的谈话很说明问题。他说：“现在，美国还没有把中国摆在它的议事日程上……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①这段话有几层意思。首先，当时中苏关系仍然处于不正常状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牵制苏联是重要的。其次，美国是西方世界的头，一些西方国家虽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他们仍然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还不能充分发展起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中国整体的国际环境能起到强烈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再次，中国搞现代化，需要同西方合作，需要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中国产品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显然可以成为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总之，在邓小平的设计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证明，这个设计是完全正确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高调出访美国，使刚刚建交的两国关系获得了强劲的推动。中国也通过这次访问高调地向全世界宣布改革开放。正如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说，访问“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①

第二个节点，抵制冷战结束的冲击，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坚持改革开放。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西方世界普遍对冷战如此结束兴高采烈，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胜利。^② 冷战结束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混乱；在外交上，西方国家对中国联合施加压力，国际形势一时十分严峻。邓小平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作出精辟的分析和论断，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③ 使中国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和制裁，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邓小平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④ 同时，1992年他又到南方进行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引导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在经受了国内发生的风波以后，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下，中国既没有如一些美国观察家预料的那样步苏联的后尘，^⑤ 也没有走回头路，而是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

第三个节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从1986年开始与关贸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403.

^② George Bush,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December 25, 1991,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0388>;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6, Summer 1989, pp. 3-18.

^③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编、张光佑副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④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162页。

^⑤ 参见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总协定进行“复关”谈判，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转变为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直到 2001 年 11 月正式加入，经过了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内的阻力也不小。但中国领导人在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主动参与国际竞争这一点上态度一直非常明确、积极，强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从 21 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中国“入世”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进一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针对国内不少人担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对我国一些产业带来冲击的问题，江泽民主席明确指出，“加入世贸组织符合我国根本利益”，“加入世贸组织对我们有利有弊，但总的看来，利大于弊”，“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利和弊、机遇和挑战，要科学分析和全面认识，对于有利的一面，要抓住机遇，积极加以运用；对不利的一面，要抓紧工作，努力规避风险。”^①

“入世”谈判的关键是与美国的谈判。正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又飞来横祸：1999 年 5 月 8 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参与北约对南轰炸的美国飞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也中断了双方的谈判进程。中方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又寻求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排除了干扰，使谈判得以恢复。在谈判的紧要关头，1999 年 11 月 15 日朱镕基总理亲临外经贸部谈判现场，终于拍板克服了障碍。在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后，2000 年克林顿政府全力以赴，使国会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这是中美建交二十多年来最具实质意义的突破，以往对中美正常贸易待遇的年度审议不久后就成为历史，经贸关系在新世纪中成为整个中美关系的推进器、压舱石。2001 年 11 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0-198 页。龙永图事后谈到，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带来很大的冲击，得不偿失，有些同志甚至从政治上讲，这是美国人拿这个事情来分化我们的一个手段。在最后协调各个部门意见时，是朱总理用他的权威统一了各方面的意见，这是很重要的！赵忆宁：《龙永图回忆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入世谈判内幕》，《21 世纪经济报道》2011 年 11 月 21 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121/5106827.shtml>。

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①。

第四个节点，中国参加二十国集团。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遏制金融危机的蔓延、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挑战，二十国集团（G20）平台应运而生。美方为举办首次峰会，从一开始就与中方密切沟通。中方立即对召开峰会表示支持，并同意胡锦涛主席亲自赴会。事后美方对此多次表示感谢。^②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着客观冷静的估计，并强调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在2008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以“同舟共济，互利共赢”为题发表演讲。^③胡锦涛出席了G20华盛顿峰会，并在会上作了“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演讲，强调各国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必要的财政、货币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应防止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④从此，二十国集团成为实行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的主要国际平台，这是国际政治多极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参与到国际金融和经济政策的决策中来，而不再是“对话国”，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中的第一次，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有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来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参与G20峰会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大的施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鉴于当时中国已经是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又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13年底达到3.9万亿），中国的参与令人瞩目。如果不是二十国集团，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可能会被推迟，或者遇到障碍。

第五个节点，2016年G20杭州峰会和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日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94页。

^② 参见周文重：《斗而不破——中美博弈与世界再平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③ 温家宝：《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8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5/content_10252192_1.htm。

^④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举行，胡锦涛出席并讲话》，中国政府网，2008年11月16日，http://www.gov.cn/2008-11-16/content_1150357.htm。

内瓦的两次演讲。从 2008 年年底开始，经过 8 年努力，二十国集团已经从最初应对危机的紧急举措，变成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这样，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相平行，一个新的机制产生了。在这个机制中，发展中国家多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话语权从一开始就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这个机制从创立之初就确立了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力和地位。^① 中国领导人参加了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大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得到了相应提升。2016 年 9 月 4—5 日，G20 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用四个 I（Innovative, Invigorated, Interconnected, Inclusive）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走向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确立了新的历史方向。^②

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参加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力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阐发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接着，他又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倡导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③ 演讲在世界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二、中国营造和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成功经验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在处理外部环境方面，在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① 约翰·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郭树勇、徐谔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88 页。

^②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新华网，2016 年 9 月 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6/c_1119515149.htm。

^③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的全文》（2017 年 1 月 18 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19/c64094-29034230.html>。

第一，抓住时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南巡之中，都反复强调要抓住时机。“不抓啊，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机一晃就过去了。”^① 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就抓住了发展经济的可贵机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和“入世”这两个节点上。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来到城市，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专业技术，要解决数亿农民工的就业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时，恰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它们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正在物色目的地。于是，中国大陆敞开胸怀，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引了进来，“大进大出”，解决了数亿农民工就业的问题。虽然境外投资者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而我们自己只是挣了代工的工钱，但解决了农民工的就业，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国的城镇化作出了贡献。当然政府的税收也增加了。在改革开放前期，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功不可没。

“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抓住的又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如果中美双方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双方的谈判代表都估计，中国入世将会拖好几年。^② 因为 2000 年是美国大选年，竞选是美国政治的要务。实际上，在 2000 年克林顿政府推动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时，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的处境就比较尴尬，因为民主党的支持群体劳联—产联不支持这项立法；新政府在头一年也不可能倾注全力于此。什么时候两国政府可能重开谈判就很难说了。而本世纪的头七八年，世界经济总体向好。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成为一个大趋势。中国经济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开始了真正的腾飞。在“入世”后的头十年间，中国实现了向全球贸易大国的历史性跨越，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 20%，货物贸易总额从 2001 年的 5 096.51 亿美元增长

^①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 273 页。

^② 巴尔舍夫斯基的结论是“如果在那天没有达成的话，会拖很长的时间”。龙永图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中国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和美国的谈判将会拖好几年。”“如果我们丢掉了 1999 年 11 月达成协议的机会，也许中国现在都没有入世，也许会推迟 10 年、推迟 5 年”。赵忆宁：《龙永图回忆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入世谈判内幕》，《21 世纪经济报道》2011 年 11 月 21 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121/5106827.shtml>。

到2010年的29740.01亿美元，达到了起始时点规模的5.8倍。^①贸易强劲地拉动了经济发展，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0%。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元增至2010年的40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世界排名从第6位跃升至第2位。^②如果中国当初在与各国进行“入世”谈判时犹豫不决，舍不得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不想吃小亏而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么，等过了几年，金融危机来了，在危机中或危机后的复苏时期再“入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难说了。国际社会中有这样的例子。

第二，与国际接轨，以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可能没有阻力。这种“开放倒逼改革”的方略，就是借助扩大开放所带来的外部力量，推动自身内部实现制度调整。在过去四十年中，有四波大的“开放倒逼改革”。第一波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开放的试验田，既为中国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也带来了市场经济，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冲击。第二波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浦东新区成为先行者，在开放过程中，“倒逼”启动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第三波出现于21世纪初。在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相衔接，并由此开启了诸多领域的改革，仅废止、修改和制订的法律、法规就有3000项之多。在关税减让、消除贸易壁垒和完善国内贸易法律体系等诸多方面，中国都进行了持续的改革。第四波开放正在进行之中，上海自贸区就是一个“开放倒逼改革”的压力测试平台，目标是营造一个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以及公平统一高效的营商环境，其核心是通过改革促使政府管理经济、贸易和投资的行为国际化。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谈到在上海建立自贸区的设想时说：“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③时隔两年，2015年3月，李克强会见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的境外代表时又强调，“要用开

^① 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 石广生：《历史的回顾——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WTO经济导刊》2011年12期，第22-29页。

^③ 《怎样理解通过开放倒逼改革》，2017年3月4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c6a9a5e1e3b552b653eac1e.html>。

放倒逼改革，促进国内企业在国际上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①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以“开放倒逼改革”也仍然是有效的方法。

第三，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受益于国际社会到回馈国际社会。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益于国际社会。从安全方面说，这四十年世界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被打断，没有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大的干扰。从经济方面说，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过程中，没有国家予以强烈排斥。中国于 1971 年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恢复了在联合国下属的各种专门机构的席位。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于 1980 年 3 月和 9 月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成员国地位，并开始与这两个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的“入世”谈判虽然经历了较长时间，但最终还是修成正果。奥巴马政府虽然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加大对中国牵制和平衡的力度，但中美两国在经贸、二十国集团、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已经有能力来回馈国际社会，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尤其是对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以互联互通为重点、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经济合作倡议；所有参与方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实行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不排斥或针对任何国家，所有有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参加。倡议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2008 至 2009 年，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举行系列会谈和建立峰会机制，成立了金砖国家集团，2010 年南非加入，2015 年又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013 年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于 2015 年正式成立，截至 2017 年 5 月已经有了 77 个正式成员。“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也在不断推进和拓展。

^① 《李克强力推开放倒逼改革，国务院常务会 13 次部署》，中国政府网，2015 年 8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3/c_128088747.htm。

三、今后面临的挑战和中国的应对之策

当前，国际局势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在和平与冲突、发展与衰退、开放与孤立、自由与保守、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各国再次面临重大的权衡与选择。西方后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新兴大国彼此的竞争都突出了。^①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正在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能力增强了，影响、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增强了，国际上有点风吹草动，中国经受得起，国际上有点压力，中国也扛得起、顶得住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树大招风”也成为现实，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非议、怀疑、担心增加，新一波“中国威胁论”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中国早已清楚表明，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②“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这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③但是，和这些相对应，在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却总是担心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搞一套，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于 2017 年底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这些文件把这个时代定义为“大国竞争”的时代，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诬称中国“正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课题组：《世界步入更加动荡的多事之秋》，《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1 期，第 1-7 页；冯玉军：《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3 期，第 9-15 页。

^② 《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新华网，2013 年 9 月 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8/c_117273079_2.htm。

^③ 习近平：《在中美省州长论坛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 年 9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9/23/c_1116653149.htm；《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新华网，2015 年 9 月 2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3/c_1116656143.htm。

在全球破坏美国的利益”，“正在打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① 还高高举起了贸易战的大棒，摆出了一付与中国全面竞争的架势。欧盟跟着美国的调子，动作频频，先是出台了反倾销调查新规，将中国单列为市场“严重扭曲”的国家；随之又出台决议，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担心“中国制造 2025 计划”，害怕中国成为高科技中心，德、法、意三个欧洲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要联手加强对外资收购的审查，目的是阻遏中资的并购。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还提出了西方与中国“技术冷战”的奇谈怪论。他们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覆盖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担心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增长。德国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过去与中国关系一直很密切。如今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总理却告诫一些巴尔干国家要提防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渗透巴尔干”，警惕中国“将经济关系与政治问题挂钩”。在第 54 届慕尼黑欧洲安全会议上，加布里尔妄称“一带一路”不利于民主自由，抨击中国利用“一带一路”的投资宣扬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表示，欧洲“不能把新丝绸之路的规则交由中国制定”。美、澳、日、印还要联手推出一项联合发展地区基础设施的“大计划”，以对抗“一带一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②

如何应对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呢？笔者在这里提出三点浅见。

第一，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一心一意搞建设”^③。这四十年我们这样做了，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当前各方面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也很艰巨。我们要集中精力解决好这些问题，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这场攻坚战，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外部世界。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② 《环球时报》2018 年 1 月 30 日、2 月 23、24 日。

^③ 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 页。

中国这四十年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超越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记录，十三亿多人口实现工业化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在取得伟大成绩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忘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要被国外的一些说法（如购买力平价法）所忽悠。不要忘记，我们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双方之间在各方面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近来，我们一些媒体和学者表现得有些头脑发热，提出了一些明显不符合事实的看法，如“中国国力已经超过美国”，讨论起“中国如何引领亚洲世纪”，等等。学术界多数人不赞成这些说法的。我们在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两个方面都要力戒浮躁之风、虚骄之气。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都要与中国的国力相称。中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增加自身的亲和力，避免自负的大国主义。

第三，保持战略定力。不论美国、欧洲说些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经过近四十年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之间高度相互依存，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盟，都是谁也离不开谁，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只是过去合作面比较突出，现在竞争面比较显眼而已。现在，不论是美国还是别的国家，要想再遏制中国已经不可能了，即使主张对华强硬的舆论也明白这一点。^① 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现在又写进了我们的宪法。即使国际环境一时变得比较严峻，中国应仍然坚持建设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消解或搁置分歧，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继续享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收稿日期：2018-03-12]

[修回日期：2018-04-09]

[责任编辑：孙震海]

^① Kurt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March/April 2018.